

日本侵占旅大期间实施奴化教育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王俏峰

(大连市第五中学, 辽宁 大连 116033)

摘要:在日本统治旅大的40年间,统治当局把殖民教育分为中国人学校和日本人学校两大系统。他们一方面企图把中国青少年培养成驯服的奴仆和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将日本移民后代培养成“忠君爱国”、“随土而安”、“在世界各地到处开拓”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包藏的祸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关键词:旅大;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奴化教育;后果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10)05-0026-02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政府就以“赞助清政府的教育事业”为幌子,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渗透和扩张。其主要途径,一是吸引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二是向中国派遣大批日本教习。

1896年以来,日本政府的外交官、政客和学者纷纷来中国游说,乘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的需要,采取吸引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的政策。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13人赴日本留学,以后则逐年激增。至1906年,中国留学日本学生达到12000人。日本政府此举的主要目的就是培植亲日势力,以便向中国扩张。日本早稻田大学负责人青柳笃恒说:多培养一名支那(中国)青年,也就是日本势力向大陆多前进一步。日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更露骨地宣称:日本势力扩张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是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留学生“散布于古老帝国”。习武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等将日本化”^[1];习自然者,必将吸收日的技术,与日本“发生亲密联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

阶梯”;“习法政者,将以日本为楷模,为将来改革的准则”。总之,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地扩张势力于大陆。而清政府对此的想法是试图通过选聘日本教习来华任教,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经验,来挽救晚清的腐朽统治。1901年3月,李鸿章即向日本东文学社负责人中岛裁之请求聘任2000名教习来华任教。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也都或请求聘任日本教习、或派员赴日本考察教育。至1906年,日本在华教习人员约600人,以后逐年增多,分别担任师范教育、陆军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政法经济教育、警察教育、医学教育等部门的教学工作。任教机构下至幼儿园,上至大学。这些教习总体看是为其“大陆政策”效劳的,带有明显的文化渗透教育扩张性质。其根本的目的是以此来控制中国的文教事业,培植亲日势力。

1904年5月末,日军与俄军经过激战后侵占了金州城,金州日本军政署首先设立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是为日本侵占旅大地区后开设最早的中国人学校。1906年5月,日本利用俄国侵占时期的教堂在旅顺开办了寻常(普通)高等小学校。接着在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相继开办日本小学校。1909年5月,又在旅顺建立关东都督府中学校。同年,关东州5个行政区中心地和满铁沿线大站各设一所官立公学堂。1914年在大连开办神明高等女学校。

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如此大规模地设置学校,其目的十分明确。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时,日辽东守备军军政长官神尾光臣就发布通牒称:“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效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

任务是教育事业。”^[2]要求在占领区城镇设立学堂,讲授日语,并强调各学堂必须聘用经日军司令官批准的日本人担任教师。这是日本官(军)方对中国居民进行奴化教育的第一道命令和政策性文件。日本把在关东州办学施教作为日本实施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相配合的“首要任务”和“第一步棋”。其宗旨是从精神上消磨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扫除障碍,铺平道路。1906年3月,关东州民政署正式颁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规定:“公学堂以向中国子弟教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规定将日本天皇的《教育敕语》颁布日作为公学堂的庆祝日。规定每周日语10节,汉文7节,学校的节假日也要按日本学校的规定来安排。总之,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建立学校,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奴化教育。出于国际间的忌讳,特别是慑于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顽强反抗,日本侵略者不得不采取谨慎行事和掩人耳目的策略。日本统治者对中国人进行教育始终围绕着巩固殖民统治这一根本方针进行的。日本政府宣称:“我国对满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促进日满的文化融合,互相亲善和共存共荣。”

日本在旅大开设日本人学校,也是其推行殖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09年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在关东都督府中学校创立典礼上称:“本府与国内府县不同,它在帝国将来的大发展上,据有重要位置,负有重大责任。因此本府的教育方针,不能以与国内各府县相同为满足,还必须充分学习本府所处的地理、历史位置,即北接俄国及其势力范围,南有德国据胶州湾,虎视眈眈。其能处二强间,启迪诱被中国人。保持东洋手

收稿日期:2010-04-16

作者简介:王俏峰,女,大连市第五中学一级教师。

足之谊,作为帝国开发大陆的先驱者,舍称关东都督其谁?这是须学生人人知晓之事。旅顺乃世界公认的难攻不落要塞,当占领此处时,我国几万勇士为皇国奋战献出生命。如何活用这一新历史,培养皇国忠君爱国的精神,正是诸君的责任。”大岛义昌这一典型的殖民言论,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企图教化旅大人民,淡化或放弃自己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去作亲日、服从侵略、甘于殖民统治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是教育在旅大的日本人忠于天皇,成为顽固的殖民主义者。概言之,就是教育中国人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教育日本人学会并善于统治中国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开始变本加厉地在旅大地区乃至东北全境大规模地进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实行教育统制,将关东州的教育彻底纳入殖民主义教育的轨道。

殖民统治当局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牢牢控制教育权。关东州设内务局学务课,同时在大连市役所设学务课,在旅顺市役所和旅顺、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设庶务课学务系。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长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其用心是通过汉奸代理执政;另一方面,上层统治人物直接插手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操纵和控制各级教育。同时强行推行统一教育法规,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规定“制定教育法规及重要教育设施,均须事先呈部核准”,凡创办中等学校,“须向文教部大臣呈请立案”。

日本统治当局制定更加露骨的奴化教育方针。其要旨是,要把整个东北“变成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永久性半永久性农业国”,“防止汉民族自身的资本主义化”。还提出“实行王道主义”和“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即利用中国原有的封建意识,特别是迎合崇尚儒家道德、礼教的心态,把“王道主义”作为伪国立国宗旨,以愚弄中国人民。1910年2月,金州民政署发布《布告》,内称:“我日本在关东州守其土,治其民,就必须大力兴办学校,教育百姓。”1917年日本陆军省建议,在“满洲各地扶植帝国势力”,通过教授日语,使中国人“亲近”日本。“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宣布:“我国(指日本)对满(指东北)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促进日满的文化融合,互相亲善和共存共荣。”1927~1929年担任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在致天皇的奏折中提出:“东三省宜多设教育机构……教育华人养成亲日心,造成东三省人民永远亲日。”“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就发布“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1932年3月至7月间,被查禁、焚烧的书籍达650余万册(东北地区),统治当局强行输入大量帝国主义

色彩的反动书刊,并迫不及待地组织编写奴化教育教材。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宣传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充分地表现出奴化教育倾向。为了强化奴化教育,统治当局还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指导监督”机构,设立视学官,要求指导监督“应研究王道真义,以努力王道教育之建设”。教育指导实为教育警察,他们为统治当局收集情报,监察督办并为制定奴化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出谋划策。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开始实施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的侵略计划。1938年1月1日,日本在《学制纲要》中,强调“日满一德一心的协和之精神,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1]。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统治当局为使教育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对殖民奴化教育进行强化。统治当局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令》,要求在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增设教练课,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以“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防能力”。各校军训内容一是进行军人思想素质训练,灌输日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和等级服从思想;二是进行战斗力训练,目的是使青少年具有一定战斗力,战时充当炮灰;三是每校每年进行几次军事演习;四是进入日军军营训练。1943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失利,统治当局将体育科改成体练科,使学校体育转向军事化。

殖民统治当局以“建国宣言”和“回銮训民诏书”为基础,加强灌输奴化意识。宣扬“日满一德一心”和“民族协和”及“唯神之道”。1943年统治当局对学校校规进行修正,原来初等教育的“国民科”和中等教育的“国民道德科”一律改为“建国精神科”。其教育要点是“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忠孝”、“学生之使命”、“国体”、“勤劳”、“本分”、“唯神之道”、“至诚”、“尚武”、“报恩”、“道义”、“日本国体”、“东亚之共荣”、“国民觉悟”等。统治当局还把奴化教育贯穿在学生的日常活动中。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社和“御影奉安殿”都要脱帽行最敬礼;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敬礼,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都要举行“朝礼”,向日本天皇遥拜、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歿英灵”,诵读或齐诵“国民训”,校长或值日教员训话、做建国操等。有的学校竟一天进行3次拜神活动。“式日”主要有元旦、入学日、毕业日、万寿节、访日宣诏纪念日、日本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统治当局还要求学校成立“勤劳奉公

队”,每年参加30~45天劳役,规定不完成规定的“奉化”劳役者,不准毕业。“勤劳奉仕”活动是日本强化殖民教育的一种手段,这种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严重地损害和摧残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在日本统治旅大的40年间,统治当局把殖民教育分为中国人学校和日本人学校两大系统。为了“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中国人民”,统治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人学校,但较之日本人学校则相差甚远。日本人学校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上下连贯,形成体系,其设备完善,条件优越。日本移民受教育的机会远远地超过中国居民。据1930年统计,日本人普通教育毕业生达到92.7%,而中国人只有8.7%。经过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多年的计划调控,到1945年,占“关东州”总人口数13%的日本移民,普通中学生人数达到1.1万余人;而占总人口87%的中国居民普通中学生人数只有1000余人。适龄儿童就学率最高的1939年,日本适龄儿童就学率达99.88%,中国适龄儿童就学率仅达51.3%。而在一般年度,中国儿童入学率仅在24%左右^[4]。由于日本实行强权政治和殖民掠夺,剥夺了中国居民应享有的受教育权利,使他们在社会生产、工作的各个领域里处于卑下、屈辱的地位,使统治民族确定垄断地位、特权地位,是日本殖民主义为实现永远统治、奴役旅大人民在教育上梦寐以求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企图把中国青少年培养成驯服的奴仆和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将日本移民后代培养成“忠君爱国”、“随土而安”、“在世界各地到处开拓”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包藏的祸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所标榜的“使旅大地区中国人教育近代化”的陈词滥调,最终还是被殖民奴化教育事实、教育方针、教育举措和教育结果所揭穿,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对其掠夺压迫的对象大发慈悲的。

参考文献:

- [1]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大连市志·教育志[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2] [日]满铁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满铁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M].大连:满铁株式会社,1939.
- [3]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委会.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3集(下)[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333.
- [4]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大连市志·教育志[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戴学章]